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

崔海亮

(西藏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许多中国跨境民族, 这些跨境民族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但文化风俗相同, 血脉相连。加强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 增进跨境民族内部和跨境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用经济文化纽带将中国跨境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连为一体, 培养他们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于改善周边关系、保证“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打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都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 积极探索增强中国跨境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途径, 不仅对于解决我国的跨境民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于实现世界民族的“和平跨居”也有重大启示。

关键词: 一带一路; 跨境民族; 中华民族认同; 和平跨居

【中图分类号】 D8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 (2016) 01-0035-07

DOI:10.13727/j.cnki.53-1191/c.2016.01.007

2013年9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同年10月, 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同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其后,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与李克强在国外访问时, 深入阐释了“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和广泛认同。中国政府通过成立专门领导机构、签署合作框架、完善相关政策等措施来推进这一战略。2014年10月, 由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创始国签约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 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资金支持, 推进了亚洲贸易的一体化, 也带动了俄、英、法、德等国的发展。2015年3月,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一带一路”正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秉承和谐包容、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 积极发展沿线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 努力将沿线国家建设成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沿线各国的合作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民心相通”不仅是“一带一路”战略

的主要内容, 也是推进这一战略的群众基础和措施保障。“一带一路”沿线涉及许多中国跨境民族, 这些跨境民族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但文化风俗相同, 血脉相连。以中华文化为精神纽带, 增强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 将中国跨境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连为一体, 培养他们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于改善周边关系, 保证“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 打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都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一、“一带一路”沿线所涉及的跨境民族问题

在历史上, 由中国出发的传统的丝绸之路有多条, 它促进了亚欧非三大洲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一带一路”战略所指涉的“陆上丝绸之路”有中、南、北三线。“中线”从西安往西沿河西走廊出新疆, 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和地中海。“南线”自西安往西南经四川、云南至东南亚、南亚。“北线”从西安往西北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沿岸。“海上丝绸之路”也有“南线”、“北线”之分。“南线”从中国南方的沿海港口城市出发, 经南海到阿拉伯海、印度洋, 延伸至欧洲、非洲东海岸。“北线”由中国北方沿海港口城市经日本、韩国、俄罗斯、北太平洋至北美洲西海岸。由此可见, “一带一路”以我国中西部腹地为核心, 向四周辐射到邻境

【作者简介】 崔海亮,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 2013年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西藏社会管理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 13AGL003)、2015年西藏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项目“西藏高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阶段成果。

和周边的许多国家,涉及我国西北、西南、东北以及东南沿海的广大区域。我国跨境民族所在区域几乎都在“一带一路”的覆盖之下。

虽然学术界对“跨境民族”、“跨界民族”、“跨国民族”^①内涵的界定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对其基本指向仍然可以达成共识。一般而言,“跨境民族”的地理分布较“跨界民族”、“跨国民族”广泛,本文倾向采用“跨境民族”这一概念。其内涵指的是:分别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里长期居住,但又保留了原来共同的某些民族特色,彼此有着同一民族的认同感的民族。他们虽然长期分居于不同的国家,受当地的主体民族或其他民族的影响,在语言、服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等各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在他们的传统文化的底层以及日常生活的深处,与原来的民族传统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②根据这个定义,跨境民族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跨居于两个以上不同的国家,其居住地可以连成一片,也可以分布在不同国家,甚至是跨海洋而居的民族;二是传统文化成为维系民族认同感的精神纽带。与跨界民族、跨国民族相比较,跨境民族淡化了国家主权性质和意识形态色彩,更强调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纽带作用。按照这样的理解,跨境民族不仅指跨越国境线的分属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那些散居于世界各地的汉族和其他中国少数民族也可以称为中国跨境民族。

在中国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上,与15个国家接壤,有31个民族跨境居住。跨境民族跨居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不仅存在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其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不一致的问题往往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及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跨境民族地区也成为我国民族问题集中的地区。

西北地区是我国传统丝绸之路最重要的通道,也是当今我国民族问题最突出的地区。西北边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接壤,分布着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回族等跨界民族,除回族外,其他各族主

体均在境外,且多建有主权民族国家。^③从历史上看,这些民族同中国既有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也有战争与冲突。冷战结束后,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民族分离主义思潮极大地影响了这一地区,这也是这一地区民族问题复杂的原因之一。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东突厥斯坦”民族分裂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组织活动猖狂,在我国新疆地区煽动民族分裂主义情绪,策划了一系列恐怖事件,成为我国“三股势力”最集中的地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与国家统一。此外,该地区还存在哈萨克族跨国移民问题、跨国贩毒走私问题等,这些也成为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障碍。

西南地区是我国跨境民族最集中的地区,仅云南省就有16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此外,还有藏族、门巴族等民族跨境分布,西南地区与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越南、老挝等南亚、东南亚国家接壤,这一地区成为我国民族关系与民族问题最复杂的地区。藏族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世代友好,所谓的“西藏问题”是由近代帝国主义国家一手策划所形成的。目前,西方国家仍然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近年来也策划了一系列的动乱、骚乱事件,影响了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云南、广西地区的跨境民族在历史上受中国传统朝贡制度的影响没有建立大的独立民族国家,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民族问题不太突出。但是受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境外民族分裂主义对该地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活跃在中国、老挝、泰国边境的“民族联合阵线”图谋建立“寮蒙王国”(苗族独立王国);越南的“福尔罗”(FULRO)分裂组织一直在争取建立独立的“德加自治国”;“泛泰族主义”(Pan-Thaism)认为越南、泰国的泰族、老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和中国的傣族、壮族、布依族同属“泛泰民族”,要建立包括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四川在内的“大东亚泰族联邦”。^④此外,该地区还存在西方敌

① 这三个概念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其内涵也有交叉的地方,但其基本指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指的是跨居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同一民族。关于这三个概念内涵的讨论,可参考马曼丽,张树青《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王清华,彭朝荣《“跨国界民族”概念与内涵的界定》,《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曹兴《论跨界民族问题与跨境民族问题的区别》,《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② 胡起望《跨境民族探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③ 金炳镐主编《跨界民族与民族问题》,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页。

④ 杨焰婵,陈发翠,鱼海波《云南跨境民族与中国国家安全》,《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对势力渗透问题、“金三角”贩毒问题、跨国婚姻与跨境人口流动等问题，以上都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认真考虑并妥善解决的问题。

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蒙古、朝鲜接壤，有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朝鲜族、蒙古族等民族跨境而居，中国历史上的元朝曾在这一区域建立了强大的帝国，这些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俄、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插手该地区的政治事务，阴谋分裂中国，该地区从民国以来有“蒙古国”的独立、有“伪满族国”、有内蒙德王傀儡政府。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地区又兴起了“三蒙统一”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图谋将中国内蒙古、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统一为“大蒙古国”。^①此外，该地区还存在中朝、中韩跨国婚姻与人口流动问题。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需要增强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

“一带一路”战略搁置意识形态分歧，以包容开放、合作共赢为原则，面向第三世界充分开放中国的市场，将中国自身的产能优势与资金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合作优势，以经济利益为纽带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为中国重返世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带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利于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推动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和平外交理念的充分体现，它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和气生财”、“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打破了西方“文化冲突”、两极对立的冷战思维模式，在西方的军事包围、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中实现了战略突围，体现了当今中国国家领导人高超的政治智慧，为中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转换开创了新局面。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跨境民族问题的存在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的障碍，威胁着中国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合作。加强中国跨境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强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顺利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必要条件。

(一) 增强中国跨境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必要性

由上文叙述可以看出，我国跨境民族都处于“一带一路”范围之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跨境民

族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由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一致而导致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倾向；第二，跨境人口流动问题；第三，跨境犯罪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可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而得以解决，但是前两个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问题，需要通过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交融来消除矛盾、求同存异，很难用暴力和强制的手段来解决。比如，我国西北边境的“哈萨克族跨国移民问题”。我国的哈萨克族与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为同一族源，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相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制定了优惠的移民政策，号召境外所有哈萨克族“回归故乡”，吸引了我国境内几千人迁往哈萨克斯坦，造成了我国边境地区哈萨克族群众的思想混乱，影响了我国同哈萨克斯坦的正常关系。再比如，我国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虽然有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与煽动，但动乱和恐怖活动毕竟发生在国内，其根源在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此外，东南亚国家的民族独立思潮也影响到我国西南地区。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存在，都不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而要想解决好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需要增进跨境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二) 增强中国跨境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意义

第一，增强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有利于解决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问题，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创造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我国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活动比较猖獗的地区如“疆独”、“藏独”等基本都在跨境民族地区，增强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有利于清除“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保持边境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

第二，增强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增进跨境民族境外部分与境内部分的文化交流与情感维系，有利于双边增强政治互信和政治安全，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创造一个和谐的周边环境。中国跨境民族境外部分与境内部分民族同源、文化同根，历史上与中华民族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

^① 金炳镐主编《跨界民族与民族问题》，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

化交流,绝大多数跨境民族对中华文化有亲近感与认同感。以中华文化为纽带,加强双边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唤起共同的历史记忆,增进了解,增强情感,增加互信,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创造一个和谐的周边环境。

第三,增强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获得境外少数民族的情感文化认同和道义支持,有利于向世界传播中国正面的文化价值,提高中国的影响力。中国不仅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观念和“和谐世界”的理念有利于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西方媒体无视中国近年来民主政治建设的巨大成就,肆意歪曲事实甚至颠倒黑白,垄断了新闻传播的话语权。在西方新闻传播中的中国,是一个愚昧、落后、践踏人权、专制独断的国家,美国甚至曾把中国划入“邪恶国家”的行列,要改变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中国声音”,也需要发挥中国跨境民族的作用。中国跨境民族的境外部分散居于世界各地,绝大多数加入了居住国的国籍,但他们认同中华文化,关心中国发展,他们对中国正面宣传的作用比国内对外宣传的影响更大,也容易获得西方的认同。通过发挥跨境民族境外部分在国际传媒方面的作用,客观全面地宣传中国文化,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良好形象。

第四,增强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团结境外的华裔华侨,可以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打破现有的战略格局,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大肆流行,中国周边国家也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受“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不仅许多西方大国采取了扼制中国的政策,东亚、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周边国家也加强了对中国的对抗,在经济、领土争端等问题上摩擦不断,周边关系紧张。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围剿与政治孤立中,团结跨境民族,争取他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发挥他们在民间外交方面的特殊作用,有利于打破现有的战略格局,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第五,增强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形成共同的文化信仰,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

神家园,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构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家园,对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现实而重大的意义。绝大部分中国跨境民族都认同中华文化,他们关注中国发展,盼望中国富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境内外的中国跨境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维系境外跨境民族与祖国人民血肉联系的精神纽带。“文化中国”成为超越地域、政治、阶层、宗教限定的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资源与精神支持。^①

(三) 增强中国跨境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可能性

目前我国的跨境民族多数分布于西北、西南边境,都处于传统“丝绸之路”范围之内,散居于世界各地的跨境民族是近代才移居国外的,在历史上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比如,历史上西北地区的跨境民族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原内地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十分密切,伊斯兰教和西域文化经过跨境民族区域传入中原地区,同样,在进行丝绸、瓷器贸易的同时,中原地区的文化也影响了跨境民族地区。汉、唐、元、明、清时期,中国政府在这一地区的行政管辖也大大加强了跨境民族地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先进的中原文化一直是当时少数民族学习的榜样。西南地区的跨境民族地区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通道,也是中原文化教化推广的地区。在历史上,云南以南的东南亚地区经济文化非常落后,这一区域的国家长期隶属于中国,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至今仍保持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东南亚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地区,也是华侨华人集中的地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亲和感和认同感。

今天,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重新唤醒历史上中原民族与中国跨境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记忆,增强跨境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

中国跨境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途径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一些中外媒体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版的马歌

① 崔海亮 《“文化中国”与海外华裔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1期。

尔计划”。表面上看,这两者有某些共同之处,但是,就其实质来看,二者在实施目的、秉持原则、合作方式、实施后果方面都有着本质的不同。

“马歇尔计划”以援助欧洲、扼制苏联、谋求美国的世界霸权为目的,而“一带一路”战略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谋求建立亚洲经济利益共同体为目的。“马歇尔计划”以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为基础,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安全战略;“一带一路”战略遵循平等互利、开放包容的原则,不搞集团对抗。“马歇尔计划”在援助中附加了许多不平等条件,借以达到干预和控制西欧国家的目的,使欧洲依附于美国。“一带一路”秉承自愿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①“马歇尔计划”在促使欧洲经济复兴的同时,也造成了欧洲依附于美国及美苏两大集团对抗的后果,给世界和平造成威胁。“一带一路”战略从实施开始,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表示支持,其中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有大国强国,也有小国弱国。“一带一路”战略秉承的平等互利、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必将会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新的契机,构建中国跨境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途径包括:

第一,政治上坚持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加强与周边国家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合作。“跨境民族是主权国家建构起来的,自从主权国家的出现才有了‘国家’的归属感,主权国家对所属国家是一种强控制;传统社会只有边陲与中心之分,国家对边陲是一种弱控制。”^②因此,要坚持主权平等的原则,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尊重周边国家的主权利益,增强政治互信,建立和完善与周边国家的多边合作机制,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方面加强与我国跨境民族所在国的合作,维护我国跨境民族境外部分群众的公民权益,至少在国际舆论方面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实现我国跨境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与政治秩序的稳定。

要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来看待“一带一路”战略,谋大局,算大账。继续对我国跨境

民族地区实施优惠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让跨境民族群众切实感受到中央的关怀、国家的保护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跨境民族群众的公民意识与国家认同。

第二,经济上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对外经济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吸取以前与其他国家经济援助与合作的经验教训。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定,苏联在对我国提供援助的同时,附加了一些政治条件,实际上损害了中国主权。到了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领土建立长波电台和海军联合舰队,这一损害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方面的断然拒绝,苏方因此中止合同,撤走专家,中苏关系恶化,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因不平等的合作而反目成仇。1965年到1976年,中国无私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了坦赞铁路,赢得了非洲兄弟国家的延续至今的真诚友谊,也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认同与支持。今天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要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以平等、包容、互利的立场加强同沿线国家的合作,这样才能得到周边国家的支持和认同。

发展文化旅游业是跨境民族与其他民族加深了解、增进互信、加快交融的好途径。与我国相邻的东北亚、东南亚地区都属于“儒家文化圈”,这些地区的跨境民族与中国其他民族文化同根、血脉相连,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感。^③通过发展认祖寻根、探亲访友的文化旅游有利于加强了解、增进民族情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我国跨境民族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经济因素是影响跨境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边境地区人员的流动是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迁移到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加快我国跨境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切实改善民生,不仅可以增强我国对中国跨境民族境内群众的吸引力、凝聚力,而且有利于吸引境外群众进行劳务输出与经济合作,进一步促进跨境民族地区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三,文化上要尊重我国跨境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保护和发展跨境民族文化,鼓励

① 金玲 《“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

② 李树燕 《国家建构与跨境民族国家认同——基于云南跨境民族的实证研究》,《理论月刊》2011年第6期。

③ 闫红霞 《跨界旅游:文化共生视野下的中国与东南亚》,《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8期。

官方与民间的民族文化交流,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民族理解为“想象的共同体”,有着共同地域、共同语言的族群未必自我认同为同一民族,共同文化才是民族认同的决定性因素,民族认同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文化认同。亨廷顿认为民族国家的冲突主要是由民族文化的冲突而引起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中国跨境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支持和认同。

加强官方与民间的民族文化交流,利用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和古尔邦节、泼水节、火把节、雪顿节等少数民族节日进行庆典与演出活动,政府组织要积极参与这些活动,并举行升国旗、政府领导发表贺词等仪式,此类官方与民间共同参与的欢庆活动意义十分重大,容易增进民族情感,加强国家认同。

国家要通过教育来引导跨境民族地区的主流文化认同。通过发展双语教学、推广普通话、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民族政策教育与公民意识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增强中国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

第四,在社会生活方面积极探索和平跨居模式。如何实现跨境民族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学者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和平跨居模式”,对解决跨境民族问题很有启发意义。

何谓“和平跨居模式”?周建新教授的理解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同一跨国的文化民族,长期往来互动,彼此相安,不因为内部有着不同的国家认同而相互仇视,也不因为内部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联系而诉求联合进而向国家权威挑战,他们彼此与周边各民族友好往来共生互助,这就是‘和平跨居’的基本模式。”^①这当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跨居模式”。这一模式的实现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缺乏民族精神偶像或民族英雄,参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历程,历史上没有产生过民族性高级社会组织,中央集权国家的有效控制,相关国家之间总体关系良好,跨国民族内部不存在极端势力等。^②

由此可见,实现“和平跨居”并不容易实现。周建新教授认为,中国南方与东南亚跨国民族基本达到了“和平跨居”的状态。

跨境民族有不同的类型,从其内部的文化差异性来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内部文化认同向异质化方向发展。这些跨境民族被不同国家分割的部分都向所在国的主流文化靠拢,其国家认同高于民族认同,属于向心型跨境民族。另一种是内部文化认同向同质化的方向发展。这些跨境民族被不同国家分割的部分,其文化相互靠拢,与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不断分离,其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属于离心型跨境民族。^③前一种有利于形成“和平跨居”,而后一种往往出现极端民族主义与民族冲突。

有学者对前一种类型的跨境民族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了肯定的结论。梁茂春对中越边境的壮族进行田野调查,结果发现,被认为是同源民族的中越边境两侧的壮族却具有各不相同的民族认同,中国境内的壮族倾向以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来区别与自己不同的越南壮族,其国家认同高于民族认同。^④被认为同属壮族的一个跨境民族正逐步分化为两个不同的族群。梁茂春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周建新“和平跨居模式”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不过,我国跨境民族的情况是复杂的,广西壮族的情况不同于新疆维吾尔族的情况,西南的跨境民族不同于西北的跨境民族。因此“和平跨居模式”未必适合我国所有的跨境民族地区。但是“和平跨居模式”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解决跨境民族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当今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文化交流的结果并非是“文明冲突”,而是“和平共处”。抛弃西方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思想资源,建立内部文化调适与平衡机制,则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民族问题。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地区争端与民族冲突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愿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进一步明显,边远的跨境民族地区也会加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其

① 周建新 《跨国民族类型与和平跨居模式讨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② 周建新 《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96~400页。

③ 周建新 《跨国民族类型与和平跨居模式讨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④ 梁茂春 《“跨界民族”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越边境的壮族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内部文化异质性的特征将会更加明显。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实现“和平跨居”的条件会越来越有利。

中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顺应了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吸收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思想资源，坚持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和谐包容、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与沿线国家和人民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为亚洲和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注入新活力。在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一带一路”战略必将可以解决分歧，带来共同发展，实现世界民族的“和平跨居”。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for the Chinese cross - border ethnic groups in the perspective of “One Belt , One Road” strategy

CUI Hai-li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 Xianyang 712082 ,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quite a few Chinese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along the “One Belt , One Road”. Although these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are found also in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 their customs and cultures as well as their spirit are similar.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ir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 strengthen their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for integrating them with the whole Chinese nation with a share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 which will help improve the cross-border relations ,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Belt , One Road” strategy , and break the economic blockade and political isolation of the Wes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Belt , One Road” strategy ,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way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 which will help solve the cross-border ethnic problems in China , and quicke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eaceful cross-border habitation” for all ethnic groups of the world.

Key words “One Belt , One Road” strategy;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peaceful cross-border habitation

(责任编辑 王东昕)